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全球积累 逻辑下贸易战的本质

——兼论经济全球化转向

李策划¹ 李 臻²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 南京 210004; 2.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构建的积累体系。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中国的发展路径逐渐跳出了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构建的全球积累体系。贸易战的本质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代表金融垄断资本,试图通过贸易战把中国重新纳入其构建的全球积累体系,以缓解美国资本积累困局和国内生产关系危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为打赢贸易战提供了坚实基础,“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全球化转向,即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全球化转向以提高全球协作和社会生产力为目的的全球化。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二重性;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 全球积累体系; 贸易战; 全球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 F11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20)05-066-11

中美建交以来,产业互补与市场相融推动了中美贸易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两国贸易在较小范围一直存在着纠纷。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美国优先”口号下,两国贸易磨擦不断扩大。在全球化分工中,贸易战必然会损害两国利益,阻碍全球经济发展。那么,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内在逻辑和本质是什么呢?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解释。方向等认为,贸易战是美国为了维护经济霸权对中国进行打压,世界霸权秩序存在着兴衰周期。^[1]陈波等认为,由于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生产过剩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美国霸权正在衰落,而中国经济发展挑战了美元霸权,打破了美国虚拟资本积累途径,美国为了遏制中国而发动贸易战。^[2-3]除了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忧虑政治因素外,在全球化分工中,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提高使中国与美国从合作走向竞争,并且在双边贸易中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贸易认知差异最终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4-5]也有学者认为贸易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一个合理悖论,在积累全球化的同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扩张到全世界,最终导致了逆全球化趋势,甚至是贸易

收稿日期: 2019-11-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JL0001); 江苏省社会科学项目(17EYB00)

作者简介: 李策划(1990-),男,安徽亳州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李臻(1982-),男,辽宁沈阳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战。^[6]贸易战的根源是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平衡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的全球利益失衡,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7-8]

尽管已有的研究为解释当前中美贸易战提供了一些视角和基础,但少有人从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构建的积累体系视角,分析为什么美国对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贸易战?这其中的逻辑与本质是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二重性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

(一) 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问题,虽然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一术语,但“世界市场”相关思想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经济全球化可从两个方面考察其本质,即从生产力角度的经济全球化一般和从生产关系角度的经济全球化特殊。

1. 经济全球化一般

经济全球化在最根本上是分工全球化的体现。随着技术改进,生产力水平提高,分工在内涵上不断深化,在外延上不断扩大。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工具重塑了生产工艺,不断细化劳动分工,通过分解劳动步骤,把整体劳动转化为多个局部劳动,提高协作水平。在工场手工业分工协作中,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在机器大工业分工协作中,机器把工场中的生理分工转变为机械分工,并与人结合共同组成局部劳动的内容;在互联网分工协作中,人与机器的协作从时间上扩大到空间上,连续性支配着各种局部劳动。在技术演变过程中,生产环节和链条不断延长,与技术相对应的局部劳动随之增加,但局部劳动的内容简化。

随着分工的发展,生产环节分解成独立的、相互联系的生产条块,在整体劳动演变成相互联系的各种特殊器官的同时,局部劳动在空间上紧密联系和相互协作。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以生产链条为联系纽带的分工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从工场内部的不同流程,到地理相距较远的不同工厂之间,再到跨越政治界限的国家之间,从而使分工走向全球。分工的全球化意味着生产的全球化,同时也伴随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是生产世界化的前提,世界市场的形成首先是从商业部门进行商品交换开始的,从世界各地寻找原料和半成品,运输到特定地点进行生产,并把生产的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贸易的世界化和产业资本的全球分工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协作不仅能提高劳动者个人生产率,并且能够创造一种劳动者集体的社会生产力,随着劳动力作用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因为分工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劳动者技能,降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更多价值,同时降低了管理成本等非生产性费用消耗。全球化分工也会改进和提高生产技术,“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9]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10]商品的价值有了国际价值形式,而不是仅限于单个国家的价值形式,其价值量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和贸易在世界各国有序竞争,让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使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趋同,从而提高整个世界的社会福利,让全球的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

2. 经济全球化特殊

技术进步推动分工协作的扩大,技术使用的阶级性必然导致分工协作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处于分工链条中的局部劳动被打上私有制的烙印,从而把空间分工协作带来的

社会生产力标识为资本在全球配置的生产力,并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而处于生产链条中单个器官的工人畸形化和异化,无法享受自身劳动成果。分工的空间范围越大,资本榨取的剩余价值越高。世界市场的建立是资本追逐利润的空间结果,资本不断用时间消灭空间,而随着技术进步,时间也缩短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1]31}这种联系随着分工深化,在高利润率驱使下,不断把世界各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扩大,以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和机器的使用为基础的大工业彻底改变了世界联系。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一方面需要在世界各地搜寻廉价的原料,另一方面需要把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转换成货币资本,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奠定了基础。商品资本满足了国内最终消费,而要把多余的商品资本实现,就必须在其他国家销售出去。原料和销售市场把世界各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而加快资本周转速度的内在需求又改进了交通运输工具,提高了世界市场的联系程度。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产业资本和大银行资本结合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在世界各国实现帝国统治。除了原料和销售市场之外,金融资本输出也成为联系世界市场的重要手段,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落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不断巩固。在互联网技术革命以后,信息技术加速了社会分工国际化,生产的标准化、模块化促使企业内技术分工转向全球。世界各国不仅在原料和销售市场上密切联系,更是在产业链上实现高度分工协作。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了高技术,进而控制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并且随着金融自由化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工构成了“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在交换不平等中形成了资本主义全球积累体系。

(二) 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职能

无论是世界市场的建立,还是经济全球化,民族资本与跨国资本都是在国家框架内进行资本积累。国家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核心原因是保护私有财产。^[12]因此,国家是富人用来反对穷人、或者具有财产的反没有财产的而组建的。列宁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13]国家的使命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政府是国家政权的体现,本质上必然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政府制定的政策代表统治阶级意志。^[14]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1]33}这个委员会不仅在本国内以所谓自由、民主的形式实行压迫和统治,使资产阶级整体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还在全球制定所谓国际规则,帮助建立核心——外围的帝国主义全球积累体系,剥削他国劳动者,转移剩余价值。

国家及政府为资本积累全球化保驾护航。在大航海时代,每个国家的新兴资产阶级在竞争中不断在全球开拓殖民地,西班牙、荷兰等国家以战争形式保障新兴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的积累。最终,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和荷兰,在全球搜寻廉价的原料和广阔的销售市场,开拓了世界市场,摧毁资本全球积累的一切障碍。当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英国资产阶级获取利润时,英国政府在尝试通关失败后,发动了鸦片战争,为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迫使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资产阶级开始崛起,与英国一起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其他国家在国际中的分工仅是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原料和销售市场的争夺也在中心国家之间不断进行,并引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全球积累中所发挥的职能,国家是垄断资本跨国发展的代理人。

随着技术的发展,当代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分工全球化,资本通过产业链分工在世界各国掠夺和转移剩余价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中心资本,处于产业链高端环节,其他国家则是外围资本,处于产业

链低端环节。中心资本控制外围资本,产业链低端环节辅助产业链高端环节,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各国纳入其资本积累的全球积累体系中,为其提供超额利润率。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及政府在代理资产阶级利益时,除了野蛮的战争工具外,还会采用比较“文明”的工具,如制定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贸易政策等。贸易政策是维护一国统治阶级利益的直接上层建筑反映。在国际分工深化、产业联系密切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制定贸易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从而能够控制和限制外围国家的产业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因此,如果中心资本在全球构建积累体系受阻,则会利用政府这一代理人通过各种方式打破阻碍,贸易战正是其中最常用也是有效的一种手段。

二、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构建积累体系

(一)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经济全球化

当前,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垄断资本时代,金融垄断资本具有全球化扩张的内在动力。^[15]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控制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成为凌驾于主权国家的“资本帝国”。为了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找到的方法是把大量过剩资本投入房地产、股市、基金、债券等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使金融取代生产贸易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金融资本向金融垄断资本转变。在金融垄断资本阶段,经济全球化不仅有商品贸易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还有金融全球化。弗朗索瓦·沙奈强调了当前金融全球化的影响,“我把它(全球化)定义为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积累方式,它构成了当代自由世界秩序的实质内容。”^[16]因此,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金融垄断资本主导下构建的全球积累体系。

在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商品贸易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越来越成为金融全球化的载体,成为金融全球化的附属品。尤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继续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职能,拥有超中心的地位和霸权地位。^[17-18]美元作为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使用范围超越了主权国家的区域,代表支配全球生产要素的权力。金融垄断资本以美元为工具不断向生产领域和商业流通领域渗透,借助跨国企业、集团等巨大垄断组织实现积累的全球空间扩展。在资本积累逻辑驱动下,第三世界国家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资本价值链的重组以及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技术性控制中又一次被纳入到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积累体系,被金融垄断资本掠夺。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展是以金融和货币自由化为前提的,如果一国实行金融和货币限制,金融垄断资本则会借助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冲破这一限制,如墨西哥、巴西等国家放松金融管制,是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的条件。随着世界各国解除外汇、放松金融市场管制、提高投资自由化,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和支配全球生产和流通过程,剥夺和转移世界各国创造出来的价值和财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率。

(二)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全球积累的路径

为了在全球获取垄断利润,构建全球积累体系需要以产业资本扩张为载体。随着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发展,企业内分工向社会分工发展,提高企业网络协作能力,推动形成产业链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推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打破国家条块分割的市场壁垒,生产协作突破了地理空间和国界限制,“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19],即推动国家局部工人化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分工。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全球产业链则是构建全球积累体系的重要路径。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国际分工基础上重构全球产业链,通过分包和外包,推动其国内的生产制造企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从而使民族国家的生产发展为跨国生产。金融垄断资本依托跨国公司、世界财团等为载体,通过跨国并购等手段获取各国工厂、企业、产业的所有权,把它们置于金融

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的所有国家由于本国的工厂、产业和产业链都失去了独立性。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全球产业链的路径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控制全球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伴随全球产业链协作的是全球生产企业的网络化协作,根据生产网络中企业的分工和层级不同,可以把全球生产企业划分为核心企业和外围企业。核心企业是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掌控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核心生产环节,其余生产环节均外包给外围企业。核心企业在模块化生产中拥有“看不见的设计规则”,并通过模块连接外围企业的“看得见的设计规则”。核心企业可以根据核心生产环节的需要调整这一规则,即通过研发和创新提高“看不见的设计规则”,从而引领外围企业的生产工艺和标准升级。外围企业从属于核心企业,在生产链条中进行分散的制造、加工和组装环节,执行核心企业主导产业链中的生产任务。核心企业整合产业链分工,以整体工人的角色实现商品的社会劳动,让商品资本进入最终消费,完成产业资本的循环,实现高额剩余价值的积累,获取垄断利润率。

自“温特制”形成以来,美国科技企业一直制定着全球产业链规则,推动全球生产工艺和标准升级。苹果公司就是通过外包生产制造环节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网络化企业。苹果公司控制手机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塑造“微笑曲线”的价值链。在苹果手机生产链条中,苹果公司总部设定苹果产品的“看得见的设计规则”,并把产品分割成若干模块外包出去。苹果公司负责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如研发 iOS 操作系统、设计 iPhone 手机、进行苹果手机商品全球销售,其他零部件全部外包给全球 760 多个供应商,最后再由富士康进行组装,这种产业链的核心-外围分工模式决定了苹果公司在利润分配中的垄断地位。

美国的科技领先全球,创新能力独树一帜,拥有较多的世界级核心企业。高科技企业在初创时期需要与金融垄断资本结合,甚至被金融垄断资本支配。依靠研发和创新的高科技企业需要大量的预付资本,同时也具有较高的风险系数,而一旦成功则能凭借其在产业中的垄断地位得到垄断利润,因此,大的热衷于赌博的金融垄断资本投入,被称为风险资本。风险资本作为预付资本投入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和创新,一旦高科技企业成为制定产业规则的核心企业,风险资本便会变成企业的股权,金融垄断资本家也就成了核心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影响和控制核心企业的发展。金融垄断资本对产业资本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和统治力,资本家在核心企业中代表金融垄断资本执行职能,创造垄断利润。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家凭借对资本的所有权,利用风险投资渠道,控制核心企业,因而控制了全球产业链发展,并且分享核心企业获取的垄断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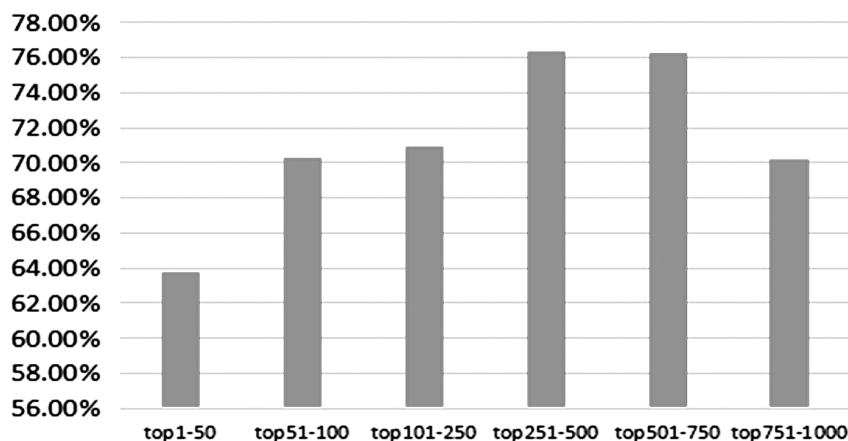


图1 2009 年全美 1000 家大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第二,以虚拟资本支配和控制全球产业链协作。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了资产证券化趋势,使资产和社会财富以虚拟资本形态表现出来,尤其是在资本流动高度自由化的互联网时代,全球股票、债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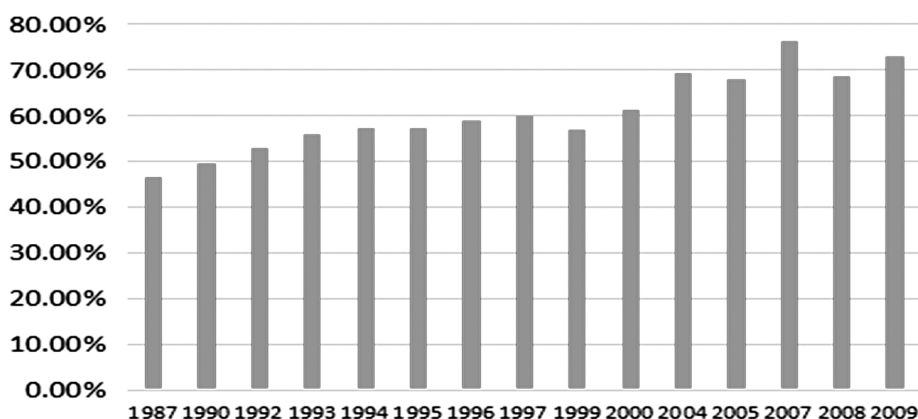


图2 全美1000家大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年变化

信托等形式的所有权凭证能够在不同国家交易。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企业为了缩短进行扩大再生产所需积累最低限度货币资本的时间,往往以股票、债券、信托等对未来收益的所有权凭证作为抵押条件,通过资产证券化从外部获取货币资本。金融垄断资本通过购买世界各国企业的证券化资产,拥有了各国企业的所有权凭证,除能获得这部分企业的未来收益外,还可以代表资本行使投票权,操纵和控制企业的生产过程,从而在全球支配和控制产业链发展。由于生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股权高度分散,金融垄断资本以不多的资本就能够成为跨国公司的大股东,进而操控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产业资本。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虚拟资本形式在全球操控产业链企业,从而构建了以产业链为载体的分工协作。虚拟资本成为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全球产业链的工具:一方面,虚拟资本把全球生产要素调动起来,形成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并且表现为虚拟资本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虚拟资本建立更大规模的垄断,提高生产所需最低资本数量,反过来提高生产对虚拟资本的依赖度,进一步强化虚拟资本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属性在全球交易虚拟资产,尤其是在经济金融危机以后,“量化宽松”后大量的美元可在世界各国购买贬值的证券化资产,从而拥有产业链分工企业的股权,支配产品生产的国际协作。金融打破时间和空间束缚,美元超过主权国家的限制,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实现了“电子游牧”,“资本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以云速度、电速度控制和掠夺全球,所到之处,一片狼藉。”^[20]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积累体系中,虚拟资本规模不断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08年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前,全球的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已达596万亿美元,相比2000年增长了6倍,是全球股市总值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的11倍。^[21]其中,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已高达300多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25倍。^[22]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虚拟资本手段购买企业证券化资产,世界各国生产企业呈现出国际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和支配。

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构建的国际积累体系中,金融化和去工业化是应有之意。在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积累体系中,利息表现为最初的真正果实,而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利润只表现为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正是这种颠倒转变了的资本间关系,金融垄断资本的权力不断增加,使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获得垄断利润。美国公司利润的部门构成中,金融部门的利润占比呈振荡上升趋势,从1977年的18.16%上升到2010年的35.38%,几乎翻了一番,而制造业部门的利润比重从45.19%下降到15.52%,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并且制造业部门通过虚拟经济活动实现的收益占其利润的比重不断上升,最高时达到57.8%,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也超过了20%。^[23]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通过控制生

产的核心环节,非核心环节外包给其他国家,导致美国工业生产中间投入超过 27% 需要从全球其他国家购买,更有 50% 以上的产品需要进口,导致美国去工业化。^[24] 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 1953 年达到了 30%,到 2015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10%,劳动人口转移到了零售、物流等行业。

三、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角色

(一)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

全球产业链分工把商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和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每个国家的企业只生产产品的一部分。由于不同国家的技术和劳动力技能存在差别,每个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也有差别。正如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和外围企业一样,在国家局部工人化的国际产业链中也具有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核心国家是在国际产业链中占据主导的国家,拥有核心企业,制定整个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则,推动世界生产工艺标准升级,而在国际产业链中从属和跟随核心国家的外围国家中,外围企业比较集中,被动接受世界产业规则和生产工艺,承担产品的加工和制造。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94 年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国积极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全球产业链参与度超过了南非、巴西、俄罗斯、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25] 依靠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优势,在加入 WTO 后,中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外包,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2010 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 19.8%,首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5 年制造业的占比高达 22%,稳居世界第一。^[26]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成为世界生产制造基地,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拥有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2001 年中国占美国进口比重为 7.5%,到 2017 年上升到 17.4%。于此相对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上升,2001 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占美国贸易顺差的 23.0%,到 2017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67.9%。但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构建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中国仍处于中低端环节,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外围国家,受美国等核心国家制定的产业规则和生产工艺制约。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受核心国家产业发展的影响。

(二) 中国逐渐跳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构建的全球积累体系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把世界各国都纳入其构建的全球积累体系中,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链分工规律共振,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具备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唯一能够生产联合国工业目录大类所有产品的国家,并且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控制。

第一,美国核心生产环节垄断优势和高技术优势逐渐丧失。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深入,承接大量核心企业的生产外包,通过“干中学”获取技术溢出,拥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人才资源储备。通过结合中国要素禀赋优势和产业基础,立足创新,不断攻克技术难题,推动企业竞争力提高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断攀升,不断缩小与美国核心生产环节的代差,甚至在一些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核心国家,能够制定全球产业的标准,如中国的核电技术、高压输变电技术、高速铁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制造能力,推动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2015 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个重点领域攻坚,力争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不断向上游攀升。虽然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从属地位,但随着 5G、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中国有可能利用新技术实现

“弯道超车”,突破原有全球产业链分工定位,构建新的全球分工体系。

另外,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虚拟资本手段无法支配和控制正在崛起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循序渐进,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进入中国的数量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一些核心企业没有资产证券化,例如华为没有进行资产证券化,并且 98.93% 的股权被以工会为载体代表的员工持有,从而排除了虚拟资本对生产的干扰,使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无法通过虚拟资本控制华为。美国金融资本无法支配和控制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核心企业,从而导致其全球积累路径在中国失效。

第二,金融业开放循序渐进,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导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胁迫失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为了保护国内金融安全,总体开放水平较低,对外国资本持有的银行、证券、保险行业股份及经营范围有所限制。如 2012 年外资银行资产占国内银行资产总额为 1.8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3%;中国没有设立外资独资的证券公司,中国和外国合资(中方控股)的证券公司资产占全部证券公司资产总额的 5.74%;外资在财险市场的份额为 2.1%,低于其他国家。^[27]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过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 2015 年“股灾”以后,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资金融通是其重要途径,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中国金融业进行了新一轮对外开放。如中国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证券公司的持股比例限制,不再对合资券商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等。通过循序渐进的开放,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效避免了墨西哥式危机。墨西哥金融业“休克”式的开放,使外资控制政府发行债券的 70%、股市总额的 1/3,在美联储加息后,外资回流到美国,导致墨西哥比索贬值,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金融业新一轮对外开放提高了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2018 年 6 月,我国 A 股正式纳入 MSCI 指数;2018 年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增加近 6000 亿元,目前总量达到约 1.8 万亿元等,这些无不说明中国金融业具备走向国际的能力和信心,不再受金融垄断资本的支配和控制。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削弱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频繁,带动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从 2009 年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RII)程度不断提高。2009 年 RII 为 0.02%,到 2018 年时 RII 达到 2.95%,虽然与美元国际化指数 51.95% 相差较大,但增长速度较快,十年增长了 147.5 倍。2016 年,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后,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占比一直稳步提升,成为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的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同时也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28]随着上海金、人民币铁矿石期货、人民币原油期货等相继挂牌交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职能,代表国际价值的一般形式,削弱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金融通措施的实施,2018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人民币交易结算量超过 2 万亿元,与 21 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美元的支配权力进一步被削弱,从而对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体系产生了重要冲击。

四、贸易战本质:美国政府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

美国学者戴斯勒曾评价:“综观大部分美国历史,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确起到了主导作用,贸易政策太照顾他们的利益了。”^[29]当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积累受阻时,美国政府则会充当金融垄断资本家的管家,以贸易战甚至战争的形式扫除国际上积累的障碍。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竞争力领先全球,其中 TRON 作为开源 PC 系统远远领先于 Windows 系统,DRAM(电脑内

存) 已经占据世界市场的 80% , 远超过 Intel。但由于阻碍了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率, 美国政府代表金融垄断资本向日本发动贸易战, 利用《超级 301 法案》针对日本的“人造卫星、超级电脑、TRON”等商品实行贸易壁垒。在签订《广场协议》后, 日本芯片竞争力断崖式下跌, TRON 也彻底失去 PC 世界话语权, 美国 Wintel 制成为全球产业标准, 控制了全球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中国加入 WTO 后,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 给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但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正在跳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构建的积累体系, 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因此, 美国政府代表金融垄断资本不断向中国施压, 并最终挑起贸易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美国政府就开始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对中国产品频频发起“双反”调查。特朗普上台以后, 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根据“301 调查”结果, 列出了建议征收的 1300 个中国商品关税清单, 对清单上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 25% 的关税。2018 年 7 月 6 日正式生效, 标志着中美贸易战拉开了帷幕。

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借口主要有: 一是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 迫使美国企业技术转让; 二是中国实施产业政策, 尤其是限制金融业市场准入; 三是中国贸易顺差巨大, 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事实上, 特朗普政府实施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 因为这三个借口正是中国跳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全球积累体系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中国高科技技术企业打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技术封锁, 金融市场监管则使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力受限, 中国贸易顺差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构建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果, 而中国贸易顺差的背后是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 对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金融垄断资本为了获取垄断利润要求美国政府打破中国发展路径, 把中国重新纳入全球积累体系中。在“美国优先”的霸权思维指导下, 贸易战成为代表金融垄断资本的美国政府的武器, 并辅以政治、军事手段, 实现金融垄断资本获取垄断利润的要求。事实上, “美国优先”不过是美国资本优先, 更确切的说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优先。贸易战对美国产业资本和消费者只能是增加再生产的费用。因为, 全球生产链产生的全球协作力远超任何一个封锁国家内的协作力, 从而导致生产效率提高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降低。“美国优先”必将提高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 进而提高美国底层劳动者再生产所需成本。事实上, 如果苹果公司将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 其生产成本将提高 37% , 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 1.01% , 就业岗位将减少 216 万个, 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将增加 2294 美元。而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 美元成本, 相当于美国家庭收入的 1.5%。^[30] 美国企业可节约成本 20% ~ 60% , 一些生产企业向政府递交反对贸易战的申请书, 但无法阻止特朗普政府为维护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继续发动中美贸易战。

五、中国应对贸易战与全球化转向

为了应对贸易战危机, 避免全球经济陷入“特朗普陷阱”, 中国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着手。在国内, 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保持战略定力,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转变经济发展动能,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全面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增强中国经济的“底气”。在国际, 要继续依托“一带一路”倡议, 在平等合作基础上, 进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当前,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化发展, 加大各国基础设施建设, 为世界提供了公共产品, 在提高各国国内生产要素流动的同时, 为各国产业分工协作提供了基础条件, 从而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 实现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中国本着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发展理念,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继续推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实现各国互利共赢互惠发展。

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致力于推动世界命运共同体建设,使全球化开始转向。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是经济全球化通过整合世界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强全球协作能力,加快资本周转速度,提高全社会生产力;二是贸易主导国通过全球化进行资本积累,实现本国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全球化主要为了第二点,即把世界各国纳入其积累体系中,进行资本积累,第一点只是全球化的副产品。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以后,尤其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球化开始转向。

在特定资本权力主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化发展呈现不同阶段。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全球化依次经历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把商品销售全球,把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以德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把资本输送到全球各地,深刻变革了资本输出目的国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实现贸易全球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把生产环节外包给全球各国,重构全球生产分工,实现生产全球化。全球化每向前一步,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内部生产关系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全球性依附和积累则进一步加深。经济全球化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时间和空间修复,通过延迟时间和扩张地理空间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式,即“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吸收过度积累”进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但当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技术进步迟缓,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严重失衡,导致全球化不断受到挑战。^[31]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意图把中国重新纳入全球积累体系之中,用中国创造的劳动剩余缓解美国资本积累困局和国内生产关系危机。因此,一旦通过贸易战实现了这一目标,美国又会重新充当自由贸易的“形象大使”,在全球推销所谓自由贸易,就像20世纪90年代通过贸易战把日本重新纳入美国全球资本积累体系后,仍旧鼓吹贸易自由化一样。美国依靠高科技和军事实力,在国际贸易中制定双重标准,实则是维护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国内表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际上表现为推动世界各国的产业链分工,形成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在国内体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在国际上体现为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因此,以中国为主导构建的全球化必然转向第一点,增强全球协作力,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第二点则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全球化转向的今天,构建富有活力、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平衡普惠的全球化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各国的期盼,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构建的全球积累体系必然被打破,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也必然会失败。

参考文献

- [1]方向,魏艾.基于马克思霸权周期理论解析当前中美贸易关系[J].广州:学术研究,2018(10):84-92.
- [2]陈波,赵启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视域下的中美贸易战根源分析[J].武汉: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29-32.
- [3]李晓.贸易失衡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J].天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9.
- [4]戴翔,张二震,王原雪.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J].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18(4):11-17.
- [5]钟飞腾.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J].北京:社会科学文摘,2018(12):14-16.
- [6]郑一明,张超颖.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J].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4):8-15.
- [7]杨圣明,王茜.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兼论“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J].北京:经济研究,2018(6):52-66.
- [8]徐增文.“中美贸易战”本质及其根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开封: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10):269-270.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6.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8.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Simon Stander. State Theory and Civil Society [C]//Paul Zarembka. Why Capitalism Survives Crises: The Shock Absorbers. Brighton: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45 – 69, 55.
- [13] 列宁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14.
- [14] 刘凤义, 张超鹏. 论国家二重属性与政府的经济职能——兼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J]. 长春: 社会科学战线, 2017 (10): 36 – 43.
- [15] 卢晓坤. 从“帝国主义”到“帝国”: 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 [J]. 北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4 (2): 134 – 139.
- [16] 弗朗索瓦·沙奈. 资本全球化 [M]. 齐建华,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
- [17] 尹应凯, 崔茂中. 美元霸权: 生存基础、生存影响与生存冲突 [J]. 北京: 国际金融研究, 2009 (12): 31 – 39.
- [18] 林小芳. 美元霸权与被颠覆的世界 [J]. 北京: 红旗文稿, 2009 (11): 18 – 21.
- [19]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11.
- [20] 尹斌. 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与中国发展战略 [J]. 北京: 国外理论动态, 2011 (12): 46 – 49.
- [21] 颜至宏. 金融海啸的〈祸根〉和〈灾底〉 [N]. 信报财经新闻, 2008 – 12 – 30.
- [22] 刘海藩. 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应对 [J]. 北京: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 (2): 16 – 19.
- [23] 张伯伟, 任希丽. 全球失衡、金融危机及其前景分析——基于经济长波视角 [J]. 天津: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1): 19 – 28.
- [24] William Milberg, Deborah Winkler. 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Offshoring in the USA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34): 275 – 293.
- [25] 李正, 武友德, 胡平平. 1995—2011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动态演进过程分析——基于 Ti VA 数据库的新兴市场国家比较 [J]. 北京: 国际贸易问题, 2019 (5): 69 – 84.
- [26] Gary Gereffi, Joonkoo Lee. Why the World Suddenly Cares about Global Supply Chains [J].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12, 48 (3): 24 – 32.
- [27] 王洋天, 郝玉刚. 基于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实践和启示 [J]. 贵阳: 贵州社会科学, 2018 (09): 11 – 17.
- [28]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人民币国家化报告 [R]. 2019.
- [29] 保罗·斯威齐. 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M]. 陈观烈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73.
- [30] 戴斯勒. 美国贸易政治 [M]. 王恩冕等, 译.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 4 – 5.
- [31]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 [M]. 初立忠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89.

责任编辑: 蔡 强